

文史专家、文化名人的故友后人细说海上文坛之往事故人



李果 主编

• 绿土文丛 •

海上艺文散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
果
主
编

绿
土
文
丛

海上艺文散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艺文散记/李果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08 - 07789 - 8

I. 海... II. 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453 号

特约编辑 秦玉兰

责任编辑 孙 瑜 张 翼

封面设计 王小阳

海上艺文散记

李 果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0 插页 3 字数 281,000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7789 - 8/1 · 539

定价 28.00 元

“绿土文丛·卷二”

编委会主任：陆 健

编委会副主任：朱米天

策 划：李 果 陈青生

学 术 顾 问：贾植芳 陈青生

编 委：陆 健 朱米天 李 果

陈青生 张 雄 潘 潮

俞宽宏

主 编：李 果

副 主 编：潘 潮 俞宽宏

喜相叙(代序)

——从宋庆龄创办的第三儿童福利站到虹口区图书馆

● 丁景唐

我怀着喜悦和忆念的心情,前往虹口区图书馆出席由虹口区文化局、虹口区图书馆召开的“现代文化名人在虹口”文献资料室顾问组筹备座谈会。虹口区是上海现代文化名人荟萃的地区,也是现代文化设施比较齐全、文化活动和国际文化交流活跃的地区。1996年,虹口区率先为区内的十大文化名人故居挂牌,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文化名人的业绩,作出努力,取得良好的成绩。现在又召集各方面专家学者广泛征求意见,征集文献史料,建立专库,集中收藏,供展出研究以及文化交流和普及宣传之用,实在是件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大好事,体现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一名在文化战线上工作了多年的老兵,作为六十多年前居住于斯的虹口少年,能和虹口区的文化主管同志们、各位学有专长的新知旧识相叙一堂,出主意,想办法,我感到极大的喜悦。

这次在乍浦路245号虹口区图书馆相叙,对我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引发了我对半个世纪前,在乍浦路245号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工作时的温馨忆念。

半个世纪前,是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解放后改名中国福利会)选定昆山儿童公园的一角——乍浦路245号辟为第三儿童福利站站址。它创立于1947年11月,到现在恰好是五十周年。第一任站长为我国著名戏剧家于伶同志的夫人柏李(周尔贤),副站长陆子淳(解放后,曾任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辑)。1948年秋,于伶和柏李同志撤离上海,去了香港,组织上让我从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教学岗位调至宋庆

龄主席(中福会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续任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我有缘多次见到这位为祖国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伟大女性,衷心引为莫大的荣幸。

少年儿童的文化福利工作和妇婴保健工作是宋庆龄从事的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她为帮助祖国花朵的健康成长,培养他们成为未来对祖国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7年,宋庆龄先后在沪西晋元小学、沪东区通北公园和虹口昆山公园的一角创办了第一、第二、第三儿童福利站,对附近贫困的失学儿童和妇婴开展文化教育、妇婴保健和供应营养品等儿童福利工作,得到社会的赞誉。

五十年前乍浦路245号第三儿童福利站仅有一座半圆形的铁皮活动房子,附有一小间狭长的简陋棚房,总共加起来只有100平方米左右。工作人员不过八九个人,包括站长、教员、医生、护士等,但工作量甚大。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从清晨到傍晚,一批批的儿童到这里来识字读书、阅读图书、就医,贫苦的母亲带婴儿来看病,领取婴儿营养品。活动房子里充满着孩子们欢乐的笑声,洋溢着教师医务人员与母亲的温馨之情。还有儿童剧团(解放后改建为儿童艺术剧院)的教师和十几位儿童演员也在教室里进行排练活动。小小的空间和紧凑的时间巧妙地排列组合,在铁皮活动房子内,演奏出一支支美妙的少年儿童欢乐交响曲。

当时的政治环境已非常险恶,反动派垂死挣扎。宋庆龄主席有时还到儿童福利站看望孩子们,关心他们的学习与健康。有次,她陪外籍医生来为师生查病,亲自翻译。冬日的阳光和煦地照出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的庄严风采。她那伟大的母性之爱,像冬日的阳光温暖着孩子们和教育人员的心身。

临近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抓紧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悄悄地教孩子们学唱《山那边呀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扭跳《朱大嫂送鸡蛋》等小秧歌剧。其时,我因早在1947年春就被列入反动派的黑名单,于是转移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宋庆龄老宅,隐蔽在宅内的难童救济站。我与从大场疏散来的山海工学团的难童们、教师们,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你是灯塔》,迎接上海的解放。

上海解放后,我回到乍浦路245号第三儿童福利站,兼任附设于

245号的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会虹口区中心工作站站长，党组织调戴辉同志任副站长，做我的助手，还调集十几位工会干部和义务人员（其中有三站的“小先生”），组织遣送流落在闸北、虹口、提篮桥三区的大量外地难民回乡，生产自救。这项工作被列为解放后上海的重点工作，同志们风里雨里、没日没夜，终于完成这项紧张繁重工作。（参看《我在宋庆龄老宅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刊于《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6年5月第2期《纪念宋庆龄同志逝世15周年》特辑。戴辉同志当时为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委。）

在遣送难民工作的同时，师生们还紧张投入慰问解放军活动和宣传工作。不久，我们动员一批“小先生”、“小护士”参军，欢送他（她）们入伍。当宋庆龄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消息传来时，师生们集会庆祝，欢呼雷动，连铁皮房子也震动得几乎晃动起来。这是乍浦路245号小小福利站最兴奋的一天。

1949年冬，我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我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了孩子们和同事们，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在迎接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几天，我又来到乍浦路245号虹口区图书馆门前，半个世纪前，昆山花园边上一长条狭小、简陋的铁皮活动房子已改建为占有半条马路的伟岸的六层大楼，100平方米的空间已扩展为3300平方米的包括少儿图书馆在内，有各种现代化设施的藏书30万册的虹口区图书馆，有各类在图书馆学方面有专长的人员50人。我伫立门前，凝视着乍浦路245号的门牌，联想浮翩，心潮澎湃，天翻地覆慨而慷。

半个世纪之前，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她的事业竞放光采，不断发扬光大。我想，在宋庆龄创办的第三儿童福利站工作过的战友，还有今天正在虹口区图书馆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我们应当继承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宋庆龄的光辉传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1997年

附言：据戴辉同志告诉我，1949年冬，我离开第三儿童福利站后，1950年3月，在乍浦路245号福利站原址筹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儿童图书馆，5月5日正式成立。1951年6月扩大规模迁至北京西路1647号（胶州路口），8月1日开幕，乍浦路245号改为该馆的虹口阅览室，戴辉任主任。1952年12月为筹划上海示范性的少年宫，虹口阅览室也随少年儿童图书馆并入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解放前，第三儿童福利站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有60年代解放军的炮兵团长，著有《瞿秋白传》、《陈独秀传》、《郁达夫传》十几部著作的黑龙省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观泉，著有《中国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史》等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张学恕等。

（丁景唐先生系上海虹口区图书馆“现代文化名人在虹口”文献资料室专家顾问组组长。本文作于1997年，曾刊当年9月的《绿土》第19期，现征得丁先生同意，作为《海上艺文散记》的“代序”。）

目 录

喜相叙(代序)

- 从宋庆龄创办的第三儿童福利站到虹口区
图书馆 丁景唐(1)

文 坛 故 事

- 周恩来与郑振铎 陈福康(2)
- 中国第一个创作木刻讲习会
- 鲁迅与内山嘉吉的真挚情谊 周国伟(7)
- 鲁迅与小林多喜二的情谊 周国伟(14)
- 鲁迅并非一味讲“硬译” 顾 农(22)
- 瞿秋白在东照里的峥嵘岁月 周国伟 史伯英(26)
- “霹雳火”林庚白 陈漱渝(33)
- 和诗痛斥周作人 周允中(37)
- 茅盾与郁达夫 邓牛顿(42)
- 丁玲在“文革”中的一段“自白” 王增如(46)
- 缅怀丁玲 苏兴良(51)
- 苏雪林与胡适一次罕为人知的冲突 陈漱渝(54)
- 朱自清日记里的钱锺书 顾 农(58)
- 钱锺书怎样夸奖女儿 顾 农(60)
- 上海“新潮社”的成立与消散 陈青生(62)
- 曹靖华与上海“新潮社” 陈青生(71)
- 从文学走向革命的张闻天 苏兴良(75)
- 鲁彦在厦门事迹考 柯文溥(77)

张幼仪:婚后的寂寞	丁言昭(82)
叶灵凤的三顶帽子	陈漱渝(86)
被误认为色情小说家的王小逸	周允中(89)
与葛福灿闲谈徐訏	韦 泱(92)
回忆施蛰存先生	姚大勇(97)
江上青的左联战友——陈君冶	周允中(100)
他,在抗战流亡中死去	
——父亲记忆中的艺术家沈振黄	孔海珠(102)
上海文坛奇人——胡治藩	胡思华(110)
回忆与赵瑞蕤先生的交往	陈梦熊(119)
李健吾译屠格涅夫	叶嘉新(124)
解冻时节赴京华	苏兴良(127)
陈子展、周楞伽联手反击“至情文学”	周允中(131)

书 文 漫 话

唐弢注鲁迅《门外文谈》的版本	龚明德(134)
鲁迅与《海上述林》	周国伟(138)
周氏三兄弟合作的唯一成果	顾 农(144)
赵家璧情系《良友画报》	赵修慧(148)
赵家璧与内山书店	赵修慧(155)
千秋出版社	龚明德(161)
“真美善”与“真善美”	叶嘉新(164)
刘延陵与《诗》月刊	苏兴良(166)
凤凰的和鸣与号手的独奏	陈永志(170)
《炉中煤》与《梅花树下醉歌》的写作日期	陈永志(174)
新发现郁达夫的一篇杂文	
——介绍佚文《倭寇的穷技》	陈梦熊(178)
《狗史》·王新命·田汉研究	陈青生(182)
《色彩》二题	叶嘉新(191)
圣野的童诗之旅	韦 泱(196)

方玮德的身后之诗文集和生前之“私印品”·····	叶嘉新(200)
--------------------------	----------

影 剧 钩 沉

沧桑历史显辉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虹口电影事业掠影 ·····	周志正(206)
虹口的早期电影院·····	叶永广(219)
许如辉与中国早期电影音乐·····	许文霞(227)
追忆影剧老作家曹雪松·····	项纯丹(240)
百年中国电影史上几位被人淡忘的影人·····	蓝为洁(251)

信 札 存 录

一封复信的教诲

——纪念林辰先生·····	陈梦熊(262)
陈伯吹谈儿童书店的一封信·····	陈梦熊(265)
李霁野复我的一封信·····	陈梦熊(267)
楼适夷谈上海“孤岛”文学的复信·····	陈梦熊(270)
丁玲两信均写于元旦·····	龚明德(274)
抗战胜利前后白薇的四封书信·····	邓牛顿(276)
周作人一封未收集的信及其他·····	王锡荣(281)
徐霞村关于文学研究会的复信·····	苏兴良(286)
黄源 40 年前复我的一封信札 ·····	陈梦熊(291)
文气相投的朋友圈子	

——从邵洵美的一封邀宴信说起·····	孔海珠(296)
叶圣陶给我的一封信·····	欧阳文彬(300)
潘公展缘何给赵家璧写信·····	赵修慧(302)
后记·····	(308)

周恩来与郑振铎

● 陈福康

早在五四时期，周恩来同郑振铎就肯定互相知道对方了。因为周恩来当时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郑振铎则是北京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两地相距不远，两人又都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文。1920年8月，觉悟社召开年会，周恩来提出只有把五四以后诞生的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才能改造中国。于是，他带领邓颖超等十名社员进京找李大钊先生，请李大钊先生指导和帮助。李大钊很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便建议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几个进步青年团体一起开会讨论。李大钊亲自开了一份社团名单，计有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16日上午，这五个社团的主要骨干在陶然亭开会，李大钊在会上做了指导。并于1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开会，正式成立了一个名叫“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发表了《宣言》和《约章》。

关于这次活动，《少年中国》上有报道，可惜没有写出与会者的名单，但我认为郑振铎肯定参加了。因为，郑振铎是人道社（即《人道》编辑部）的负责人，“人道”这个名字就是他提出的；另外，他又是曙光社的成员。

而1927年春，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郑振铎是进步团体上海著作人公会的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曾领衔与胡愈之等人在报上发表对国民党的抗议信，表达了进步文化人士大无畏的正义感。当时被敌人通缉的周恩来读到了这封信，深为感动，一直记在心中。他后来曾多次同夏衍谈起此事。夏衍在纪念胡愈之的文章中，在纪念郑振铎诞辰90周年的大会上，都提到了周恩来曾赞扬郑振铎等人的这一正义行为，认为这是进步知识分子在革命困难时期和关键时刻对党的

支持。

1949年初,郑振铎接受党中央的邀请,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南下香港,再乘船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郑振铎激动地参加了在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盛会和阅兵式。从此,他经常能见到周恩来。在他遇难前的9年间,常常直接领受周恩来的指示而工作。他刚到北平才十一天,就作为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的代表,去巴黎(后改为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行前,周恩来找代表谈话,并亲自过问他们的行装和健康状况。为了抵御西伯利亚的严寒(当时是乘火车去的),周恩来特地指示为代表们每人做一件貂皮大衣。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温暖了郑振铎等人的心!5月25日晚,代表团回到北平,马上到天安门参加群众欢迎大会。郑振铎在日记中写道:“散会时已暮色苍茫,将近八时了。晤周恩来。晚餐后,晤阿英,极为高兴!”从他像称老友阿英一样地称“恩来”来看,他同周恩来已经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隔一天的阿英的日记中写道:“与振铎同志谈散佚文物事,拟成立组织董理之。请彼拟计划,俟回平时(按:阿英明日离开北平回天津一次),再找周副主席研究。”郑振铎一贯重视保护国家文物,他主动起草了有关计划后,由阿英转呈周恩来。周恩来还专门请阿英进中南海谈话,赞同郑振铎的建议。阿英当晚即向郑振铎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使他大为振奋。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最初规划。后来,开国大典后,郑振铎成了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在文物事业上作出重要贡献,这与周恩来的知人善任分不开。(郑振铎后来又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开国前夕,郑振铎参加了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国旗图案征集条例等工作,并参与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这些重要的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郑振铎又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主要从事文物工作、政协工作以及文化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在这些方面都经常直接向周恩来请示,每次都得到及时有力的支持和英明的指示。例如,郑振铎建议将各项保护和征集

文物的法令加入土改学习文件中，便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为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郑振铎打报告给周恩来，又很快得到周恩来批示，总理还特意指示当时在他身边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许广平亲自到上海指导。后来，郑振铎请周恩来为鲁迅纪念馆题词，总理也在百忙中题了词。郑振铎筹备的一些重要的文物展览会，如1951年的敦煌文物展览等，周恩来总是亲临观看。对于一些重要文物的收购，郑振铎更是直接报告周恩来。1951年9月，郑振铎奉周恩来之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在途经香港地区短暂逗留时，他得悉流失的清宫国宝“二希”（即《中秋帖》《伯远帖》二件书法珍品）可能在香港被外国买去，便紧急向国内报告。10月31日，他在印度德里致上海友人的信中，便提及救护稀世珍品“二希”事，说是“总要设法买下的”。11月5日，周恩来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当时仍在国外的郑振铎闻知此事后，极为兴奋，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凡是‘国宝’，我们都要争取的”。这成为建国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国内外传为美谈，向世人昭示了新中国保护文物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后来，郑振铎又在周恩来指示下，领导了一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为国家购回了大批国宝级古画、古币等文物，立下了卓越的功绩。

1954年6月，北京市有人提出要拆除团城。因为团城在金鳌玉栋桥东堍，汽车从文津街开来，特别是从中南海出来，往东行驶，必须经过该桥，而从桥上下时，与团城距离太近，一不小心就容易撞上去。那里更是中央首长经常开车经过之处，所以有人认为必须牺牲团城。然而，团城是极其精美、世上罕见的古建筑，岂能随便拆除？这时，郑振铎便又一次直接找周恩来了。一天凌晨，日理万机的总理亲自登上团城，与郑振铎一起研究，终于做出指示：保护团城，不损害它的一砖一瓦；拆除束缚住马路的金鳌和玉栋两个牌楼，以放宽桥面，使之向南扩张，占用中南海的一些空间。今天团城南面宽阔桥面，车辆上下时毫无撞到团城上的危险。周恩来不仅解决了团城存亡的具体难题，而且在保护历史文物与规划城市建设方面做出了范例。后来，周恩来还立下规矩：

各地在基本建设中凡涉及古文物的，都必须与有关文物保护部门商议进行。这条规矩一直坚持到现在，只是有的人常常忘记了！
1955年，郭沫若、沈雁冰（茅盾）、范文澜、邓拓、吴晗、张苏六人，联名打报告给周恩来，要求发掘北京郊区明代十三陵中的长陵。这六位都是著名学者和重要干部（张苏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也都是郑振铎的好友。郭沫若当然也请郑振铎签名，但是他经过调查研究和认真考虑，不赞成这些好友的想法，慎重地向总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建议另外试掘定陵。双方当然都提出了具体的理由，这里不必细说。从人数、地位等方面来说，前者自然占“压倒性优势”。然而，周恩来考虑下来，赞同郑振铎的意见，并指示由郑振铎、吴晗、夏鼐等人主持定陵的发掘工作。定陵试掘是成功的，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了当时在文物保护意识、保护手段、研究手段、财政经费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的不足。因此，根据周恩来的决策，对长陵等的发掘计划就搁置下来了。一直到今天，一些老专家还感慨地说，历史已证明当年周恩来与郑振铎的看法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解放初，在古籍整理规划工作方面，郑振铎是贡献最多的一位专家学者。他最早提出了重新整理、校点《二十四史》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这项历史性的工程是在他遇难后完成的，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进行。郑振铎又最早提出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有统一的规划。周恩来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隶属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郑振铎担任了这个小组的文学组组长（共分文、史、哲三个组）。他在遇难前，主持制定了《1958—1967年整理出版中国历代文学著作的规划草案》，还亲撰了序言。“文革”前的我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整理出版，基本上就是照这个规划进行的。

郑振铎于1958年10月17日最后一次率团出访，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周恩来非常悲痛，立即请陈毅同志去郑振铎家慰问。当时收到不少外国友人和团体的唁电唁函，周恩来后来亲自复电答谢。郑振铎遇难周年时，11月17日，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家信中说：“这一个多月中外交、钢铁都很忙，后来又加了志愿军回国，也参加活动了几次。

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可知周总理曾因郑振铎的牺牲而悲痛难眠。他的那首诗，可能写到郑先生，可惜他自己不满意。但愿这首诗的底稿能保留下来，能公布出来就好了。

周恩来以伟大的人格，团结教育了无数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郑振铎是其中很杰出的一位。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郑振铎的诗歌或手稿片段，因文字过于模糊无法准确转录，故用占位符代替。）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郑振铎的诗歌或手稿片段，因文字过于模糊无法准确转录，故用占位符代替。）